

#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建构:理论、历史与实践

李 松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 要:**在当代中国政治经验中,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力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主体。就理论逻辑而言,作为根本主体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作用,不仅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并定型为国家制度,而且由国家权力机关来代表人民,真正的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之中。就历史脉络而言,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教育等方式,将广大群众团结在自身领导之下,从而塑造的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既塑造人民又代表人民,并且使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力量存续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之中。就实践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内在于人民之中的领导力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都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多元一体”的政治实体即人民,推动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深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04(2024) 02 - 0005 - 07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概念、新实践、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治国理政具体过程的典型形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人民是民主实践的根本主体力量,虽然人民的范围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但是人民始终是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最坚定的推动力量。在当代中国政治经验中,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1]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内在于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都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多元一体”的政治实体即人民,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强大的政治基础。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最坚定的领导力量,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贯彻落实,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还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教育、宣传等方式,将广大群众团结在自身领导之下,从而塑造了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即人民。中国共产党既塑造人民又代表人民,使“多元于一体”的人民始终存在于政治生活中,进而使人民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

主体力量,使构成人民的各种要素能够共同参与政治生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深化。

##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建构的理论逻辑

人民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根基。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将人民主权原则落实在国家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多元政治力量形成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并将人民主权原则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落实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之中。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人民

政治性的“人民”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为了摆脱封建体制和神权政治的束缚,启蒙思想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的自然与理性基础,立足于人与社会的理性能力与自然地位,重建了政治社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人民”概念的理论生成,成为破除封建等级体制与宗教神权统治的重要行动。虽然,启蒙思想家通过预设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理论,为建构“人民主权”国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启蒙思想家长期受到封建等级体制与宗教神权的压迫,对个人自由极度推崇,导致其理论建构的“人民”概念是“抽象的

收稿日期: 2023 - 10 - 26

作者简介: 李松(1992 - ) 男,河南信阳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统战史和统战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和经验研究”(项目编号: 20AID001); 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专项课题“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 2023JDJS03)。

人”而且落实到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人”又是以“个体性”而存在的。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构建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集合性”存在,另一方面以“众意”来代表“公意”,忽视了“少数人”的意志,这也造成了西方现阶段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选举暴政”。

马克思在批判启蒙思想家的基础上,把人视为受到物质生产、社会关系等束缚的人,把阶级视为历史发展的物质性力量。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35)所以,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主体,而非抽象的权利主体。是历史与社会意义上的经验存在,而非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与理性存在。“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的’人就是‘自然的’人。在‘社会’中,人的‘自然本性’亦即人的全部‘自然需要’(食、衣、繁殖、经济生活)都均匀地得到了保障。”[3](P376)因此,人的本质就存在于这些源于“自然需要”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在这种经济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群体掌握着不同的生产资料,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拥有相似生产资料和劳动关系的群体聚合起来,形成了以财富与生产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划分。处于不同阶级的群体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避免阶级矛盾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作为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就诞生了。

国家诞生之后,在阶级社会中,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人民”成为了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P172)在历史发展中,每种所有制形态及其社会内部都蕴含着诸多物质力量的合力,蕴含着大量的生产力、资本与环境,正是这些力量规定了社会形态与历史形貌,也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些物质力量中蕴含的批判力量与革命力量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人类自我解放的发展方向。这些批判性的物质力量集中表现于阶级之中,这些阶级是社会革命与阶级解放的动力所在,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有助于推进社会革命与促进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就是“人民”[4]。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5](P636)因此,人民在历史变迁中具有了不变的属性,即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即人民,在阶级社会中人民也就天然的与“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6 •

## (二) 人民主权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为“蓝本”,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将人民主权原则落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之中,人民不仅仅是国家的主人,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意志定型为国家制度,赋予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来行使国家权力,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中,将人民主权原则切实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就人民主导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组织、阶级动员等方式,将革命的力量凝聚起来,建立革命同盟军(即人民的“初始形态”)进行了深刻的社会革命,并建立新中国,这首先解决了人民主导国家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主导国家,国家不再是外在于人民的压迫性力量,而是转变成内在地维护人民利益的支撑性力量,因此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制度必然是民主制度”[6](P203)。正如马克思深刻揭示的那样,“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7](P39)。因此,在中国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之后,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得以建立,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意志定型为国家制度。进而言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是人民意志的产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整体性政治实体的人民所形成的共同意志凝聚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人民意志不是中国民众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以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政治意志为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人民的内涵和范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的中心工作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持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存续于国家制度之中,并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中将人民主权原则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因此,这也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内置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之中,并且有全方位的制度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得以落实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同时,作为“多元一体”的政治力量凝聚成的人民又构成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人民意志定型为国家制度的核心在于创造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代表人民意志,进而通过正式国家机关的运转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将人民意志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保障人民意志转变成成为政治实践[8]。在社会主义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不同阶级的公民凝聚成为人民,并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政治

体制的形式将人民整体确立下来,并通过全过程的制度实践持续塑造和巩固人民[9]。而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落实人民主权原则的基本制度形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制度设计的历史发展历程观之,具有“复合型机关”[10]的性质。就其制度运行的过程,体现了以人民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代表政治”与反映公民利益的“代议政治”相重叠的特点,并且有效地平衡了“人民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关系,真正在国家权力机关的制度保障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将人民主权这一制度原则和政治理念转变成一种真实的政治实践。

概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教育和宣传等方式,将广大群众团结在自身领导之下,从而塑造了能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即人民。作为根本主体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发挥着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作用,不仅由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并将人民意志定型为国家制度,而且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代表人民,真正的将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实践就是要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创造美好生活[11]。毫无疑问,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主体。

##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建构的历史演进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人民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塑造形成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并维持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存续于政治生活之中,推动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深化。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民主政治发展最新制度成果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其制度的发展和深化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一) 塑造人民进行民主革命

具有历史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在传统王朝国家崩溃的情况下,将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众塑造成人民,在中国进行了深刻的社会革命。革命在本质上是人类为实现自我解放所形成的社会历史运动。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论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知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十八世纪末两次

伟大革命之前,革命这一现代概念并不为人所知。”[12](P17)她还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12](P14)。然而,中国革命并不是由成熟的、自我觉醒的革命者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林尚立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爆发于内生的革命主体力量为实现自我解放而孕育的革命形式与革命行动,而是爆发于古代的国家与政权在现代化冲击下所深陷的全面危机。……因而,它虽然诞生于革命过程中,但其本质不是整个革命的直接产物,即人实现自我解放的产物,而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产物。”[13](P8)进而言之,中国的革命不是人民群众自发寻求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产物,而是被动地卷入到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其中,作为具有历史自觉的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动员者”的角色。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拽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进程之中,传统王朝加速瓦解,作为传统国家与社会“黏合剂”的士绅阶层也随之分化解体。一部分流入通商口岸成为软弱的依附性的商业知识阶层,一部分沉淀于基层乡村社会成为土豪劣绅[14]。中国社会由此陷入“低组织化”甚或“无组织化”状态。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断的扩张,但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罗荣渠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程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体进程中进行考察,提出近代中国形成了“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三组矛盾相互交织,进而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的趋势[15](P193-197)。同时,他还认为“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势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15](P198)。无论是革命化,还是现代化,它的前提都是建立起有组织的力量,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的革命阶级进行政治动员。

由于社会阶级的分散性、革命意识的模糊性,党通过组织、动员、教育和宣传等方式,将各个革命阶层组成革命同盟军,即“人民”早期的形态。这常见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历史之中。裴宜理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就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过程中,工人运动领袖通过“文化置位”“文化操控”等方式,将当地民众熟知的节日、风俗、仪式与阶级化的社会分层观、阶级斗争的革命理念嫁接起来,组织动员起社会革命[16]。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形成的根本支撑,党在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为人民的同时,牢固地确立了自身的领导地位,在中国现代国家以人民为根基得以创建时,中国共产党就成为社会主义

中国的领导核心,因此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政治基础,同时持续不断地将中国最广大群众凝聚成人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任务。

## (二) 代表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就代表人民而言,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代表制理论。汉娜·皮特金将现代政治中的代表形式具体归纳为五种类型。一是授权,即代表必须得到被代表者的委托。二是问责,即代表必须对被代表者负责。这两种代表属于形式主义代表,它们关注的问题是代表是否经过法定程序产生和终止。三是“符号代表”,即通过一种象征使被代表者出现在特定情境中。四是“相似代表”,即代表要反映一个社会的政治构成。五是“行动代表”,即代表的行为是否实现了被代表者的意愿。这三种代表属于实质主义代表,它们关注的问题则是什么构成了代表、代表具有怎样的特质以及代表做了什么[17](P16)。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来看,形式主义代表和实质主义代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有所不同的主要是不同国家对于形式主义代表和实质主义代表各有侧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探索,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实质主义代表为主导,兼具形式主义代表特质于一体的代表制度体系。

王浦劬认为,在当代中国政治背景下,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与执政党意志在本质上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执政地位在法理意义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代表人民执掌政权、运行治权,执政党组织与其层级对应的政府体系必然融合而成“党政体制”,进而现实地体现为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和路径,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人民意志的引领和代表主体,也是国家意志的実施和运行主体[18]。王绍光认为,当代中国的代表型民主是一种实质主义代表政治:首先,在代表谁上,党和政府是代表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利益的。其次,在谁代表上,党员干部成为代表民众利益的代表。再次,在代表什么上,民众的客观需求而非主观偏好是代表所要实现的标的。最后,在怎样代表上,党和政府以群众路线作为实现代表的核心机制[19](P196-201)。

景跃进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则是一种“规律-使命式代表”理论的实践。其核心观点是工人阶级是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先进阶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集中体现了政治上的先进性。当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选举式代表”同样是存在的,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来体现人民主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所体现的“规律-使命式代表”优越于

“选举式代表”[20]。“规律-使命式代表”当然也是一种实质主义代表,只不过当代中国政治侧重于实质主义代表时并非完全排斥形式主义代表,“选举式代表”同样存在于中国政治实践中。陈明明延续了西方是“代议制”、中国是“代表制”的类型分析思路,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代表制政府理论。代表制政府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认为代表制存在两个关系结构,一个是“国家-人民”关系结构;另一个是“政党-群众”关系结构。就“国家-人民”关系结构而言,它遵循着人民主权原则,通过选举实现定期的授权,并借助罢免实现问责。这是代表制的形式主义面相,显而易见,代表制吸收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元素。就“政党-群众”关系结构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党,它对民众的代表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论,而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宗旨,通过为国家社会谋复兴、为中华民族谋发展、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政治实践而获得了“实质性授权”。这是代表制的实质主义面相,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代表政治理论的独特创造。至关重要,“国家-人民”和“政党-群众”两个关系结构是相互嵌入、有机统一的,将它们衔接起来并构成了代表制政府的根本的内容是人民意志,而人民意志则是民心 and 民意的统一,是党主张和民众需要的统一,是国家整体利益和公民个体利益的统一[21](P35-49)。当然,党领导人民探索的这套完整的代表制度体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中国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切实将人民主权原则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 (三) 维系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存续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出来的政治实体,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演化的。人民的演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人民基本构成要素的群众在变化,其实质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则是人民的内在结构在变化,其实质是从一种结构演化为多种结构叠加[1]。因此,面对日益分化的政治社会结构对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的侵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中轴”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其领导制度改革,以及重塑其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和调控能力,对党群关系、阶级关系,以及党和公民关系进行持续的塑造,维系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始终存续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保障人民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根本主体地位不动摇。

人民作为政治实体要持续存在并落实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绝大多数民众能够从分散走向整体的

关键。在中国现代政治中,人民不是类似于自由主义民主中的那种抽象整体,而是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人民实体是由具有公民身份的绝大多数民众组成的,并且这种组成不是松散的集合,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网络凝聚起来的,所以人民实体是高度组织化的。当然,人民的内涵和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的范围又增加了诸如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社会阶层。虽然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作为政治参与主体的公民个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益结构却是日益分化的。从这一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需要始终维系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的人民存续在政治生活之中,保持人民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全面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化改革造成的日益分化的利益格局,党通过调整社会的利益结构,保证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结构得以维系。党的十八大后,党政体制改革强化了集权逻辑,这其中隐含着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必要重新强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和调控”[22]。基于此,党强化了领导制度和领导能力。这集中体现为:其一,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二,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领导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强化了对新闻出版网络的监管,加大对思想文化舆论的引导。此外,在发展战略方面,更加凸显社会公平正义,推行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中党加强了自身作为先锋队政党的建设,以党不断强化在社会领域的领导和调控能力,来应对分权化改革带来的利益结构分化的问题,以及及时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23](P64)。更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领导作用,不是分散民众而是凝聚民众,不是代替人民而是塑造人民,不是为国家治理设置政策障碍而是为国家治理创造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源于将绝大多数民众凝聚成人民这一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生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并且党的全面领导内置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有全方位的组织体系保障。只有贯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实体才能始终

存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人民主权才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

###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主体建构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之中,人民的内涵始终保持着其不变特质,即“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力量”,但是其构成要素则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而不断地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阶级划分、政治整合、组织领导等方式,经由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主政治实践,由人民政协、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等政治力量构成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人民的“多元一体”格局,保证人民作为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始终贯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推动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与深化。

#### (一)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参与力量的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参与者,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民主政治实践的全过程。进入新时代,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并且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水平发展。首先,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日益增强。各个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群体的格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大致形成,并且民主党派的人员数量也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根据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所显示,民主党派人数由20世纪70年代的6.5万人,发展到2021年的近130万人,成员总量增加了近20倍,并有持续增长的态势。同时,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催生的新社会阶层也被吸纳到民主党派之中。其次,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的专业履职能力日益增强。一方面,民主党派成员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据统计,以八个民主党派作为整体计算,大学本科以上的比重为70%左右,中、高级职称的比重为80%左右[23]。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都具有明显的阶层代表性和专业领域代表性,可以说,民主党派是“专业参与者”[24]。再次,各民主党派嵌入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度日益深化。进入新时代,民主党派携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功能更加凸显、平台更加广阔。民主党派作为代表中国社会中较高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群体,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中,日益增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推动着中国高水平协商的实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体现的更加充分。

#### (二)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民团体

人民团体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一环,以团体协商推动民主参与。迄今为止,对群团组织的涵盖范围给出最明确规定的文件是200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后并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它规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使用行政编制或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并列出了21家参照管理的组织。除此之外,由于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属于参加人民政协的人民团体,因此也是群团组织的一种。其中,人民团体包括以下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工商联、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所属10个文艺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对外友协、外交学会、贸促会、残联、宋庆龄基金会、法学会、红十字总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黄埔同学会、中华职教社等。

人民团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团体,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它具有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性和统一战线的功能与属性。人民团体是党建立在以群体的“人民性”作政治取向划分的基础上,对能够广泛地代表人民、联系人民、服务人民的部分团体在政治地位、功能作用和资源保障等方面作出的制度化安排。进而言之,被纳入到这种制度化安排的团体才是人民团体,反之,则只是普通的社会团体。人民团体具有鲜明的国家和社团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既要代表国家整合社会、联系群众,另一方面又要代表群众利益、反映群众需求。它们的根本任务是接受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和政治动员的国家目标。在新时代,人民团体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致力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深化。每个人民团体都代表和联系着不同领域的人民群众,各人民团体之间的协商,成为有效解决不同领域群众之间矛盾的有效渠道。不仅如此,人民团体还可以通过所联系的群众参与政协协商、政府协商、人大协商,有效增强政府、社会、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因此,人民团体协商在调解社会矛盾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由工商联、工会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组成的“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就是人民团体协商民主的有效平台之一。在“三方会议”中,工商联、工会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进行广泛深入的协商,为调解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所以,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参与主体的人民团体,将党的组织体系实现对社会全覆盖的同时,也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反馈给各个层级的党政机关,以保证民众的声音能够真正被倾听到,进而落实成符合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公共政策。

### (三) 扎根社会之中的群众组织

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以城市居民委

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为代表的群众组织,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伊始,就注重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其历史经验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实践来源之一。党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强调“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25](P32)在新时代,突出基层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基石地位越发重要,高质量的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真实、管用、有效的重要标尺。

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群众团体的核心功能是代表、表达其所联系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即把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制度化的渠道“输入”执政党的执政体系之中,通过一定的协商程序“输出”成为党的具体方针政策。群众组织的利益代表功能的核心取向是在“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终端之间进行转换,直接反映特定群体的诉求,避免这些民情信息在层层传递和传达过程中发生扭曲甚至失真,使执政党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更顺畅。因此,经由这样的“输入-输出”过程,社会中个体化、原子化的利益诉求有了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通道,相关社会群体对群众组织的身份认同、组织认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过程也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群众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纽带,所代表的群体表达,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参与性的体现。

### 四、结语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社会主义民主付诸实践的具体形态,其核心内容在于通过政治建设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从而使人民作为一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始终存在于政治生活中。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中国共产党是内在于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都是人民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都在中国共产党塑造人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种主体力量,并不是在政治生活中分散发挥作用的,也不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占据相同位置、发挥相同作用,各种政治主体遵循一定的原则集合在一起、各得其所。

进而论之,人民其实是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涵盖广大群众的政治力量。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主体,没有人民这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就不会有将人民主权具体落实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实践,要言之,就没有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这种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基本要求,只要以人民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主体力量,那么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历史实践就必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过程塑造的,将人民塑造出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而塑造人民的政治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塑造人民的基本政治过程。人民作为根本主体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同全过程人民民主塑造人民是高度融合的。

#### 参 考 文 献

- [1]汪仕凯.将人民带回中国政治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3(2):129-139.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4]杨东光.革命与超越“人民”概念的中国化[J].社会科学,2023(6):122-134.
-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8]汪仕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政治的集大成创造[J].南京社会科学,2021(7):1-10.
- [9]汪仕凯,孟雨微.代表政治与代议政治的重叠: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观察[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3):50-58.
- [10]孙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特征及职权发展逻辑[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77-185.
- [11]李松.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5):13-22.
- [12]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13]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 [14]陈明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政治之维[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1):48-57.
- [1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6]裴宜理.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M].阎小骏,译.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
- [17]汉娜·皮特金.代表的概念[M].唐海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 [18]王浦劬,汤彬.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9):4-24.
- [19]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20]景跃进.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J].2007(3):16-21.
- [21]陈明明.马克思主义政府原理的中国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22]陈明明,李松.当代中国党政体制的沿革:路径与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4):1-17.
- [23]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5[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 [24]吴先宁.我国的党际协商与公共政策过程[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6):5-11.
- [2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 陈文新)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f Full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Theory , History , and Practice

Li Song

( School of Marxism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Shanghai 201620 ,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xperience , the people are the political entity power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road masses. They are the fundamental subjects of the full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 as the fundamental subjects , the people play the role of an overall political entity in political life. Not only do the people hold state power and shape it into a state system , but they are also represented by state power organs , truly implement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in the practice of full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erms of historical context , the people are the positive force shap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organization , mobilization , education , and other means , uniting the broad masses under its leadership , thereby driving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oth shapes and represents the people , and ensures the people's existence as an overall political entity power in the practice of full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erms of practical forms ,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leadership force inherent in the people. Democratic parties , people's organizations , mass organizations , and so on are all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olitical entity , which is the people , is formed ,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of full – 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 Research on the Disposa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 – Evolution – Structure"

Gao Weixing , Wu Songlin , Li Zhiga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450001 ,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How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properly handle these conflic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urgently needs to address. Based on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 subject – evolution – structure" ,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disposal mechanism system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 which includes eight mechanisms: a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 a pre – event prevention mechanism , an in – event resolution mechanism , a post – event handling mechanism , an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 a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mechanism , a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 and an emergency support mechanism. The system was verified by selecting thirty typical cas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with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cau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eight disposal mechanism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nd the resolution outcomes was positive , indicating that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may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resolution result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onformity of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 the more successful the resolution outcomes.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auses of the occurrenc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have an impac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and the resolution outcomes.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and outcom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occurring in urban areas are better than those in rural areas , and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and outcomes for risk – typ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re better than those for pollution – type conflict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disposal mechanisms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nd also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governance of other types of conflicts.

##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Liu Xiaodan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Zhengzhou University , Zhengzhou 450001 ,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 urban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is facing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The sub – district office is the terminal of urban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in China , connect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ty ,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 we take the staff of street offices as the interview subjects to obtain the first – hand interview data , and constructs a " Learning – Cognition – Behavior – Results" theoretical model that can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between by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 organizational change , execution ability , and bureaucratic pressure play an influential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mong them , organizational change is the key driver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o enhance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 execu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link for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o be transformed into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 and bureaucratic pressure is the factor that hinder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n primary – leve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Rooted in the Chinese story , summarizing the